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3.008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影响研究

张士杰¹, 王倩文²

(1. 安徽财经大学 发展规划处, 安徽 蚌埠 233000;
2.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 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 其市民化水平较高; 阶层的上向流动, 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 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 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 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 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 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 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 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 鼓励就近市民化, 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 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 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社会阶层;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流动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3-0061-10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 on Citizenization

ZHANG Shijie¹, WANG Qianwen²

(1.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i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o test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 on citizenization of the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is higher among the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with a higher sense of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he class can also improve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family stratum and self-assessmen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play a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on citizenization level respectively.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reveals that the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收稿日期: 2023-12-06

基金项目: 安徽省科研编制计划重点项目“以人为核心的安徽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优化研究”(2022AH050537);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主观阶层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ACYC2023190)

作者简介: 张士杰, 男, 安徽怀远人, 安徽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王倩文, 女, 安徽淮南人, 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振兴。

female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itizenization, and there is a greater potential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or citizenization. Therefore, diversified social platforms should be built for the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unblock the upward mobility.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femal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tegr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n be explored and nearby citizeniz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he class status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hould be maintained, so as to promote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ze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Keywords: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social clas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class mobility perception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是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加快市民化进程。2012至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共计增长约13个百分点,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城市的规模稳中有增,已有超过2亿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在城镇工作。然而,他们未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该群体的城市融入感、生活幸福感普遍较低,2019年有约51.6%的农业转移人口无城市落户、定居意愿^[1]。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农业转移人口不仅要完成入户籍的市民化,更要实现融入城市的市民化。如何确保该群体能融入城市,如何让他们不仅“进得来”,更能“留下来”,是当前及以后市民化工作的重点,也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十四五”时期及以后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拉动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会改变其职业、收入、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等,改善其社会阶层定位,取得阶层的跃升,但地理区隔与心理疏离,均使这一介于农民与市民间的特殊群体被边缘化。对于该群体而言,农民身份、农业技能、农村情结的转换不是仅凭户籍变化就能实现的,新身份的融入与新的阶层分化,需要政策推动。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已不再是拉动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的主要力量^[2],均等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配套的基础公共服务,足够的社会认同感、城市融入感、生活归属感,才是农业转移人口“留下来”背后的吸引力^[3]。

目前,国内外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鲜少与阶层认同、流动关联起来。而作为想象共同体的社会阶层是分析社会结构、人口迁移的关键要素^[4],其中,个体主观的阶层归属和地位认定直接决定其社会行为模式,且可反映个体在自我、与他人关系、社会三个认知层面的感受、态度及评价,具有比客观定位更重要的意义,应成为研究市民化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鉴于此,本文利用2015、2017、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身心状况、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经济状况、社会融入、职业、社会保障6个维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研究阶层认同及阶层流动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同时,从代际、性别、地域三个维度,进一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市民化差异。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是指拥有农村户籍、转移到城镇持续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实现职业转变却未迁入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及其随迁家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在经历乡城转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从事非农生产,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且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过程^[5]。该过程既涵盖户籍准入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包含不限于户籍的市民权利均等化^[6]。

在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根本^[7],农地确权能显著提升市民化意愿^[8],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等是影响市民化水平的重要因素^[9-10],家庭

化迁移方式能推进市民化进程^[11]。然而, 也有学者指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质是社会融入过程, 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职业转变时, 其市民身份、社会地位等未实现同步转变, 导致该群体同城镇人口间存在较大的市民权利差距, 无法真正融入城镇^[12]。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能只是入户籍的居民化, 更是转移人口在心理上产生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13], 获得与转入地居民均等的社会权利与公共服务。因此, 转移人口能否在转入地安居乐业, 才是市民化的真正核心^[14]。以人为核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聚焦转移人口的城市归属感、社会认同感、生活幸福感^[6]。

2. 主观阶层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社会阶层化趋势凸显。社会阶层包含客观和主观阶层定位的双重内涵, 即以客观指标界定的社会阶层和以自我评价、自我认同界定的主观社会阶层^[15]。就个体而言, 社会阶层既能体现个体拥有的客观社会经济资源, 又能反映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等级的主观认同。其中, 主观阶层定位至关重要, 它是集个体与他人横向比较、个体与自身过往及未来预期纵向比较于一体的综合评价, 不仅可以体现个体在综合考虑各项客观因素后的阶层地位, 更能反映其在进行社会比较后的心理感知^[16]。因此, 在解释涉及主观感知的社会现象时, 客观阶层定位因仅涵盖收入、职业等指标, 缺乏对个体心理特征及认知倾向的感知, 导致解释不具说服力甚至无效^[17]。本文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在认知层面是否接受城市、在心理层面是否融入城市, 主观阶层的解释力远高于客观阶层。

主观阶层是社会主观建构的产物, 是基于微观经验层面考察阶层关系的重要指标^[18]。在理论上, 主观阶层分为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感知两个维度。其中, 主观阶层认同是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反映^[19], 是个体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后对自身所处的相对地位、等级产生的感知^[20]; 阶层流动感知是对阶层地位变迁的主观反映, 也即个体对自身阶层地位相较过去或未来预期变化的主观评价, 其影响着个体的社会公平感^[21], 从变化方向上可分为上向流动、水平流动、下向流动。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直接决定着

个体的行为模式^[22]。相关研究表明, 主观阶层认同及阶层流动感知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且相较城镇居民, 其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加敏感^[23]。

3. 研究假说

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迁移, 其收入、职业、地位会发生变化, 社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24], 即城镇内部存在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间的社会分层, 社会成员的利益、地位存在较大差异, 进而改变转移人口自身阶层^[25]。古典社会学理论强调在地区差异化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下, 迁移者不仅要面对新环境带来的生活、行为习惯差异及文化观念冲击, 还需在流入地构建新的社交网络, 这种迁移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对迁移者生活态度具有潜在重大影响。研究表明, 当个体阶层的上向或下向流动受到限制时, 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加剧^[26], 而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人群, 其生活幸福感强^[27]。阶层的上向流动亦会强化人们的分配公平感^[28], 下向流动则弱化分配公平感^[29], 进而影响社会融合发展^[30]。因此, 主观阶层研究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主观阶层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有助于推进市民化进程^[31]。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H1: 主观阶层认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因存在年龄、性别、地域差异, 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动态不稳定组织。老一代与新生代转移人口在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社会心理、身份认同等方面均呈现较鲜明的代际差异: 老年转移人口关注城市医疗、养老保障的健全与发展, 中年转移人口更关注工作的稳定性和子女教育, 青年转移人口重视情感归属与社会融入^[32]。同时, 城镇化境遇受两性性别观念的影响, 城镇化经历能显著提升女性性别观念中的平等化效应, 提高女性的社会阶层认同感、公平感^[33]。在本地化空间范围内, 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可及性和日常互动的频繁性导致个体主观阶层认同感较强^[34]。综上,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H2: 主观阶层认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在代际、性别、地域上存在异质性。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建构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该项目调查覆盖面广, 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层次数据, 反映职业、劳动力、健康、价值观等信息, 总结社会变迁长期趋势。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选取2015—2018年度3次调查数据作为混合横截面数据, 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的特殊性, 对问卷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保留在城镇居住的样本, 剔除户口登记状况为“当前居民户口且以前也是非农业户口”, 剔除工作经历及状况为“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 鉴于被调查者回答是否有效等因素, 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显示极端值的样本数据, 最后, 共得到有效样本9129个。

(二) 变量选取

本文将主观阶层认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具体处理如下: 主观阶层认同在问卷中均为一个10级阶梯式量表, 借鉴林吴民等^[35]的编码方式, 将10级量表重新分类, 转化为5级量表, 并引入虚拟变量: 上层=5、中上层=4、中层=3、中下层=2、下层=1;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 结合已有文献, 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户口状态、婚姻状态等作为控制变量。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算方式, 结合已有文献, 可归纳为3类。一是利用宏观数

据计算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程度, 如李瑞等^[36]将市民化能力转化为转移人口与城镇人口平均工资的比值; 二是构建非线性模型C-D函数拟合市民化水平^[37]; 三是构建指标体系, 对影响市民化的因素进行分类^[38], 如从身份、权利、行为意识等维度衡量市民化水平^[39]。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代表性与简洁性、科学性与操作性、针对性与综合性要求, 借鉴程名望等^[40]的研究, 本文从身心状况、政治参与与公民权利、经济状况、社会融入、职业、社会保障6个维度, 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三) 模型建构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 将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目标函数。该方法与OLS回归相比, 不易受极端值及异常值的影响, 回归结果更稳健; 同时, 分位数回归能体现在不同条件分布下的变化趋势, 可反映被解释变量的全局特征。参照陈强^[41]的做法, 给定解释变量 x 、被解释变量 y 的条件分布用 $y|x$ 表示, 假设在总体 q 下, $y|x$ 的条件分位数函数 $y_q(x)$ 是 x 的线性函数, β_q 为 q 分位数回归系数, 设定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y_q(x_i) = x_i' \beta_q. \quad (1)$$

对于任意分位数 q , 目标函数可表示为:

$$q \sum_{y_i \geq x_i' \beta_q} |y_i - x_i' \beta_q| + (1-q) \sum_{y_i < x_i' \beta_q} |y_i - x_i' \beta_q|. \quad (2)$$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市民化水平	因子得分	66.198	0.403
解释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	综合看来, 目前在社会上, 您本人处于社会哪一层? 上层 9/10=5; 中上层 7/8=4; 中层 5/6=3; 中下层 3/4=2; 下层 1/2=1	0.856	0.383
	婚姻状态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未婚/同居=0; 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1; 离婚/丧偶=2	0.842	0.364
	性别	男=1; 女=0	0.563	0.496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1; 私塾/扫盲=2; 小学=3; 初中=4; 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5; 大学教育=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7	4.643	1.294
控制变量	普通话水平	您觉得自己普通话水平怎样? 很好=5; 比较好=4; 一般=3; 比较差=2; 完全不能说=1	3.571	1.047
	外语能力	您觉得自己英语水平怎样? 很好=5; 比较好=4; 一般=3; 比较差=2; 完全不能说=1	1.702	0.907
	每周工作时间	≤ 44 小时=1; >44 小时=0	0.451	0.498
	区位特征	东部=1; 中部=2; 西部=3	1.939	1.049
	年龄	调查年份-出生年份	40.969	11.664
	户口状态	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军籍=1; 农业户口/没有户口/其他=0	0.491	0.500

表 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说 明
身心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	您觉得目前身体健康状况是：很健康=5；比较健康=4；一般=3；比较不健康=2；很不健康=1
	心理健康状况	在过去四周内，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从不=5；很少=4；有时=3；经常=2；总是=1
政治参与 公民权利	政治面貌	您目前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 / 民主党派=3；共青团员=2；群众=1
	投票	上次居委会选举 / 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是=2；否=1
	工会会员	您是否为工会会员？是=3；以前是、现在不是=2；从来都不是=1
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	您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远高于平均水平=5；高于平均水平=4；平均水平=3；低于平均水平=2；远低于平均水平=1
	投资状况	您及家人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股票 / 基金 / 债券 / 期货 / 权证 / 炒房 / 外汇投资=3；其他=2；没有任何投资活动=1
	汽车持有	是否拥有家用小汽车？有=2；没有=1
	生活幸福度	总的来说，您觉得生活是否幸福？非常幸福=5；比较幸福=4；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不幸福=2；非常不幸福=1
	参加活动频率	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的空闲时间社交 / 串门？非常频繁=5；经常=4；有时=3；很少=2；从不=1
社会融入	社会信任度	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非常同意=5；比较同意=4；说不上同意不同意=3；比较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1
	社会公平认知	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公平？完全公平=5；比较公平=4；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3；比较不公平=2；完全不公平=1
	工作性质	全职工作=2；非全职工作=1
职业	工作状况	下列各种情况，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状况？自己是老板 / 个体工商户=5；在自己家的生意中领工资 / 不领工资 / 自由职业者=4；受雇于他人=3；劳务工=2；零工 / 散工=1
	基本医疗	城市基本医疗保险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 公费医疗：参加了=2；没有参加=1
社会保障	基本养老	城市 /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了=2；没有参加=1
	商业医疗	商业性医疗保险：参加了=2；没有参加=1
	商业养老	商业性养老保险：参加了=2；没有参加=1

回归系数 β_q 的估计量 $\hat{\beta}_q$ ，可以由目标函数最小化定义：

$$\min_{\beta_q} \sum_{i: y_i \geq x_i' \beta_q} q |y_i - x_i' \beta_q| + \sum_{i: y_i < x_i' \beta_q} (1-q) |y_i - x_i' \beta_q| \quad (3)$$

考虑到核心变量的计量单位间存在差异，为最小化模型异方差，本文将变量作对数化处理。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运用 Stata17.0 对 18 个指标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样本的 KMO 值为 0.669，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统计量的概率 P 值为 0；经主成分分析得到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特征变量，说明这 7 个主成分具有比原变量更强的解释能力；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6.95%，在因子载荷矩阵中，所有变量的 uniqueness 值都小于 0.6，表明样本数据正常，保留所有变量。

（一）分位数回归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借鉴张正岩等^[42]的做法，选取 10%、25%、50%、75%、90% 五个代表

性分位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进行分位数回归，并控制年份变量。分位数与 OLS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所有分位点上，主观阶层认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且在市民化水平 10% 和 25% 分位点上，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要高于 OLS 下的平均水平，而在高分位点上则低于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初到城市，工作、生活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社会融入度较低，主观阶层认同感对提升市民化水平的边际贡献更大；而后，转移人口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获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广阔的社交平台，此时，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推动作用减弱。控制变量中，户口状态在低分位点显著为正，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其对市民化影响转弱，可见，户籍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挥着直接作用，但其并不是全部影响因素，市民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及质量提升，仍需配备健全的城市融合机制。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外语能力、每周工作时间、区位特征、年龄均显著影响市民化水平。具体而言，

表3 分位数与OLS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OLS	10%分位点	25%分位点	50%分位点	75%分位点	90%分位点
主观阶层认同	0.262*** (24.831)	0.390*** (17.025)	0.333*** (19.302)	0.260*** (20.608)	0.206*** (17.924)	0.151*** (12.482)
婚姻状态	0.115*** (9.341)	0.172*** (6.417)	0.117*** (5.798)	0.108*** (7.339)	0.095*** (7.062)	0.072*** (5.135)
性别	0.008 (0.967)	0.033* (1.902)	0.000 (0.010)	0.001 (0.084)	0.004 (0.485)	0.006 (0.629)
受教育程度	0.037*** (8.913)	0.058*** (6.503)	0.051*** (7.557)	0.034*** (6.886)	0.023*** (5.100)	0.016*** (3.471)
普通话水平	-0.015*** (-3.364)	-0.018* (-1.922)	-0.021*** (-2.880)	-0.001* (-1.714)	-0.008* (-1.732)	-0.008 (-1.600)
外语能力	0.032*** (5.639)	0.049*** (4.015)	0.035*** (3.799)	0.024*** (3.535)	0.024*** (3.955)	0.015** (2.275)
每周工作时间	0.050*** (6.087)	0.096*** (5.361)	0.080*** (5.938)	0.046*** (4.677)	0.026*** (2.856)	0.015 (1.558)
区位特征	-0.018*** (-4.708)	-0.025*** (-3.074)	-0.026*** (-4.259)	-0.016*** (-3.564)	-0.017*** (-4.144)	-0.014*** (-3.292)
年龄	0.006*** (13.209)	0.005*** (5.834)	0.007*** (9.684)	0.006*** (11.649)	0.005*** (11.117)	0.005*** (9.706)
户口状态	0.002 (0.204)	0.039** (1.963)	0.008 (0.552)	0.000 (0.030)	-0.010 (-1.039)	-0.028*** (-2.678)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32*** (-23.038)	-1.535*** (-22.188)	-1.103*** (-21.229)	-0.687*** (-18.021)	-0.315*** (-9.097)	-0.021 (-0.562)
N	9129	9129	9129	9129	9129	9129
R ²	0.141	0.110	0.092	0.074	0.061	0.04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受教育程度、外语能力、每周工作时间对市民化的影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这几个变量对低市民化群体的作用更明显，在低市民化水平时期，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在城市的职业选择及工作性质，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业可选择面越广；外语表达的标准度和流利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转移人口社会融入度与生活质量，决定其能否更快速地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每周工作时间可能关系到转移人口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而在高市民化水平时期，转移人口拥有较稳定的社会关系资源，社交活动及范围相对固定，受教育程度、外语能力、每周工作时间的边际贡献被削弱。

(二) 稳健性检验

主观阶层地位变迁能显著影响个体自我定位^[43]。本文选取阶层流动感知作为体现阶层地位变迁的变量，替代主观阶层认同，进行稳健性检验。

阶层流动感知测度方法为：10年后的阶层状态减去10年前的阶层状态，并将结果分为三类，即向上、不变、向下，替换变量说明如表4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主观阶层认同仍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水平，即阶层流动向上的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更高，这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同时，考虑到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的反向因果作用及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说明如表4所示。社会经济地位自评是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具有阶层属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在解除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为0.539，大于OLS基准模型回

表 4 相关变量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变量替换	阶层流动感知	若“您认为您 10 年后将会在哪一个等级上？－您认为您 10 年前在哪一个等级上？”>0，则向上赋值为 1；
		若“您认为您 10 年后将会在哪一个等级上？－您认为您 10 年前在哪一个等级上？”<0，则向下赋值为 -1；
		若“您认为您 10 年后将会在哪一个等级上？－您认为您 10 年前在哪一个等级上？”=0，则赋值为 0
工具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综合看来，您认为目前在社会上，您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 上层=5；中上层=4；中层=3；中下层=2；下层=1
调节变量	家庭阶层	您认为在您 14 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
		上层 9/10=5；中上层 7/8=4；中层 5/6=3；中下层 3/4=2；下层 1/2=1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替换法		工具变量法		OLS
		2SLS	第一阶段	
阶层流动感知	0.129*** (9.435)	主观阶层认同		0.539*** (22.901)
		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1.448*** (40.267)	0.262*** (24.8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32*** (-20.557)		-0.8612*** (-23.833)	-0.732*** (-23.038)

归系数 0.262，即内生性使得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效应被低估，这说明用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和可靠性。

（三）调节效应及中介效应

社会阶层分化下，除迁移者本人外，家庭也是推动劳动力迁移的主体^[44]，代际传递效应下的家庭阶层是导致阶层流动差异的重要因素^[45]。推动劳动力迁移的不仅是迁移者本人，还包括其家庭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因此，本文选取家庭阶层作为调节变量，变量说明如表 4 所示，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表 6 中，模型 1 为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影响的总效应，模型 2 在加入家庭阶层*主观阶层认同交互项后，回归系数明显低于模型 1，且交互项回归系数为 -0.010，说明家庭阶层显著负向调节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的影响，即个体家庭阶层越高，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的影响越弱。

表 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市民化水平	
	模型 1	模型 2
主观阶层认同	0.262*** (24.831)	0.123*** (22.226)
家庭阶层*主观阶层认同		-0.010** (-1.972)
控制变量	Yes	Yes
常数项	-0.732*** (-23.038)	-0.480*** (-15.450)
R ²	0.141	0.139

解除内生性后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7 中，模型 3 为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影

响的总效应；模型 4 说明主观阶层认同对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具有正向作用，即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转移人口，其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也较高，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模型 5 表明在加入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这一中介变量后，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仍显著为正。通过 Sobel 和 bootstrap 检验（结果见表 8）可知，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其中，间接效应占比为 62.50%。

表 7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市民化水平	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	市民化水平
主观阶层认同	0.262*** (24.831)	1.787*** (50.088)	0.165*** (13.659)
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			0.164*** (15.7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32*** (-23.038)		-0.725*** (-23.504)

表 8 bootstrap 检验结果

bootstrap 检验	系 数	95% 置信区间	占总效应比/%
间接效应	0.097	(0.083, 0.111)	62.50
直接效应	0.165	(0.139, 0.191)	37.50

（四）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均基于全样本层面的平均效应，未考虑到转移人口内部差异性。为此，本文分别考察不同代际、性别、地域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认同

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由于不同代际转移人口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层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关于新老世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划定标准,选取1980年之前出生的转移人口为老一

代农业转移人口,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则定义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同代际		不同性别		不同地域		
	新生代	老一代	男	女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主观阶层认同	0.220*** (13.419)	0.292*** (21.214)	0.258*** (15.862)	0.264*** (19.085)	0.267*** (17.637)	0.246*** (10.933)	0.240*** (9.7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85*** (-13.553)	-0.685*** (-12.258)	-0.744*** (-15.170)	-0.721*** (-17.154)	-0.731*** (-16.306)	-0.691*** (-10.807)	-0.936*** (-13.496)
N	3980	5149	3990	5139	4318	2042	1772
R ²	0.138	0.128	0.134	0.148	0.140	0.108	0.149

从代际异质性角度看,老一代与新生代回归结果均显著,且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回归系数略高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可能因为老一代转移人口阶层观念与意识较新生代更强烈,主观阶层认同感的变化对其市民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更大的边际贡献。从性别异质性角度看,女性与男性回归结果均显著,其中,女性回归系数略大。王敏^[46]在对社会阶层认同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发现女性的社会阶层认同感不断提升并“反超男性”,女性的阶层认同感正从“依附型”向“共享型”转变,这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对于女性来说,主观阶层认同感的提高对其市民化水平的贡献作用更明显。从区位异质性角度看,东部地区回归系数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东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中跨省流动比例为15.0%,远低于中部地区的55.6%和西部地区的47.5%。区域内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差异较小以及阶层流动顺畅,可能是东部地区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影响较强的原因;中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地区市民化推进措施,促进市民化整体协调发展。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实际上是要促进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镇,其重要环节就是转移人口对自身阶层的评价。本文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转移人口,其市民化程度更高,且阶层向上流动的转移人口,其市民化程度也更

高;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家庭阶层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老一代转移人口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女性影响大于男性,东部地区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及社交融入情况,为其就业、生活搭建文化、技能、社交平台。如提供在职学习、周末技能培训、职业教育等服务,以扩大该群体的交际范围,提升其主观阶层认同感及社会经济地位,保证阶层流动的畅通。同时,在社会资本与政府资本通力合作下,完善企业用工制度,健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机制,制定合理有效的资金分担和管理体系,逐渐消弭农业转移人口同城镇人口间社会福利的歧视性差异,并为随迁家属提供就业指导,为其子女入学、教育提供便利与优惠,如减免书本费,提供奖、助学金等,以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价值感、归属感、公平感。

第二,针对不同代际、性别农业转移人口,分类施策。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阶层观念趋于固化,以城市为主导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可通过网络自媒体、入户宣传等方式,向该群体普及城乡统筹发展新思想;同时,通过教育为女性赋能,促进其职业发展,这对于当下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因地制宜推进市民化,尤其要挖掘中西

部地区的巨大潜力。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 灵活落户政策,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实现省内流动, 积极推动就近市民化, 保证阶层的上向流动; 西部地区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福利待遇等措施, 保障其阶层地位; 东部地区可继续强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机制, 完善随迁子女医疗、教育服务, 进一步提升其阶层认同感, 推动整体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孔翠芳, 徐勤贤. 对国家重大规划实施情况评估之思考: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例[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22, 14(3): 182-189.
- [2] 徐清. 工资“拉力”与城市劳动力流入峰值: 基于“推拉”理论的中国经济实证[J]. 财经科学, 2012(10): 37-45.
- [3] 杜巍, 牛静坤, 车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3): 66-77, 157.
- [4] 胡荣, 张义祯. 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问题研究[J]. 东南学术, 2005(6): 85-92.
- [5] 魏后凯, 苏红键, 李凤桃.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报告[J]. 中国经济周刊, 2014(9): 20-25.
- [6] 洪银兴, 杨玉珍, 王荣. 城镇化新阶段: 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 41(1): 4-16.
- [7] 刘超, 刘永久, 王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劳动经济评论, 2022, 15(1): 214-236.
- [8] 何微微, 贾仓仓. 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制度经济研究, 2022(4): 48-73.
- [9] 张心洁, 周绿林, 曾益.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量与评价[J]. 中国软科学, 2016(10): 37-49.
- [10] 张江雪, 汤宇.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度研究: 基于全国8城市大样本数据的调查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7(5): 108-115.
- [11] 李先锋, 杜志威, 李郇. 快速城镇化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与行为特征: 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4): 170-174.
- [12] 黄祖辉. 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12): 6-7.
- [13] 徐臻. 社会分层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45(1): 114-121.
- [14] 佟大建, 金玉婷, 宋亮. 农民工市民化: 测度、现状与提升路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J]. 经济学家, 2022(4): 118-128.
- [15] 周扬. 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观感知模式: 基于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的解释[J]. 社会学评论, 2022, 10(5): 220-237.
- [16] 刘晓柳, 王俊秀. 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CGSS 2010—2015的实证分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6(5): 14-27.
- [17] 胡安宁. 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 方法论辨析[J]. 社会, 2019, 39(3): 183-209.
- [18] 易卓. 教育分层、职业分化与新生代农民阶层生产机制[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3): 59-67.
- [19] 刘峰. 阶层认同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以甘肃成县为例[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 [20] KRAUS M W, PARK J W, TAN J J X. Signs of Social Class: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12(3): 422-435.
- [21] 张晓琳. 阶层流动、社会公平感与中国公民的司法信任: 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46-58.
- [22] 樊敏杰. 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J]. 南方人口, 2021, 36(6): 31-44.
- [23] 闰丙金.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 统计研究, 2012, 29(10): 64-72.
- [24] 韩宜铮. 流动与区隔: 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2): 38-50.
- [25] 孙三百, 黄薇, 洪俊杰.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 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2, 47(5): 147-159.
- [26] BREEN R.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6.
- [27] 殷金朋, 陈永立, 倪志良. 公共教育投入、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 来自微观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19(2): 147-167.
- [28] 孙敬水, 蔡培培.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4(3): 107-116.
- [29] 胡建国. 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再探讨[J]. 人文杂志, 2012(6): 148-154.
- [30] 郝晓婧. “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 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3(1): 1-10.
- [31] 钱怀安. 创新驱动视角下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 商业经济, 2022(11): 24-26.
- [32] 林亦平, 周应堂, 张斌. 农业转移人口异质性的诠释与分析: 以江苏南京、常州与扬州比较分析为例[J].

-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3): 104-108.
- [33] 孙超, 刘爱玉. 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J]. 人口与发展, 2020, 26(5): 112-121.
- [34] 张文宏, 刘飞, 项军.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公众主观地位认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4): 27-49, 226-227.
- [35] 林昊民, 甘满堂.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与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 CGSS 2017 数据[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2(1): 148-157.
- [36] 李瑞, 刘超.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2): 75-84, 120.
- [37] 徐建玲.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 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9): 65-70.
- [38] 朱健, 陈盼.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4(4): 98-103.
- [39] 刘传江, 龙颖桢, 付明辉.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 2020, 41(2): 1-12.
- [40] 程名望, 乔茜, 潘烜. 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 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3): 413-420.
- [41]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43-350.
- [42] 张正岩, 孙文策, 张晨, 等. 互联网应用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吗?: 基于 CGSS 2017 的经验证据[J]. 系统工程, 2023, 41(6): 1-16.
- [43] 陈云松, 范晓光.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 109-126, 206-207.
- [44] 呼雷雷.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测度及实证分析[D]. 西安: 西安财经大学, 2020.
- [45] 徐莉, 冀晓曼. 家庭资本与社会阶层: 基于 CGSS 2017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1(2): 72-79.
- [46] 王敏. 社会阶层认同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住房视角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评论, 2021, 9(6): 215-232.

责任编辑: 徐海燕

(上接第 60 页)

- [20] 董宝玲, 白凯, 杜涛, 等. 非遗商品的旅游化开发利用指标体系建构与测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6): 75-85.
- [21] 李烨, 王庆生, 李志刚.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风险评价: 以天津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5): 88-93.
- [22] 李江敏, 王青, 朱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体验价值体系、测量与检验[J]. 旅游学刊, 2020, 35(11): 78-89.
- [23] 李梓烽.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非遗的创造性转化[J]. 农业经济, 2021(8): 16-17.
- [24] 宋居宇, 姜卫兵, 何兰. 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1, 29(2): 366-378.
- [25] 罗焯欣, 甘翠丽, 李文, 等. 福建省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1): 276-286.
- [26] 邵海琴, 王兆峰. 湖南雪峰山地区康养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2, 45(4): 44-54.
- [27] 吴必虎. 区域旅游开发的 RMP 分析: 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01, 20(1): 103-110.
- [28] 于秋阳.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结构模型及其测度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1(5): 114-119.

责任编辑: 徐海燕